

国学教育的时代境遇： 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研究 (1912—1923)

金 国

(常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常州 213164)

摘 要: 在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中,国学教育是重要的媒介。梁启超与严修、张伯苓的早期互动为其在私立南开学校开展国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演讲或讲座以及文化学院的筹建是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学校开展国学教育的具体实践。虽然最终文化学院以失败告终,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富有深意,它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国学教育时代境遇的缩影与写照。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是近代国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私立大学国学教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国学教育在近代社会的时代命运,也有助于为现代国学教育的开展提供历史借鉴。

收稿日期:2018-04-2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争取办学自主权研究(1912—1949)”(17JYC0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项目“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研究”(2017M62190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办学自主权与办学资源: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与政府、社会互动博弈研究”(2017SJB1776)

作者简介:金国,男,江苏淮安人,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引用格式:金国.国学教育的时代境遇: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研究(1912—1923)[J].重庆高教研究,2018,6(5):64-72.

Citation format: JIN Guo. The time circumstance of sinology education: the interaction of Liang Qichao and Private Nankai School (1912—1923) [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8, 6(5): 64-72.

关键词: 国学教育; 梁启超; 私立南开学校; 私立大学; 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18)05-0064-09

围绕国学教育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 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①(下文简称“私立南开”)有过短暂的互动往来。于梁启超而言, 在与私立南开的互动中, 寄托了其对传统国学的“发明整理”; 于私立南开而言, 这一互动往来带来了私立学校发展所需的“名人效应”。关于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 亦有诸多学者关注。《陶行知、梁启超、张学良与南开学校》(夏嘉、应之, 1987)、《梁启超与南开》(王彦力, 2013) 等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梳理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渊源。《梁启超的私立大学梦》(尤小立, 2014) 更是聚焦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创办的文化学院, 探讨了文化学院创办失败的原因。尽管如此, 本文亦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的空间与必要。

大体来说, 本文主要聚焦或关注如下内容: 一是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早期互动。现有成果中多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互动的起始时间定为 1915 年。事实上, 在此之前, 梁启超就与严修有过短暂的接触, 虽然接触时间不长, 却奠定了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开展国学教育的良好基础, 而这些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却常被忽略。二是文化学院失败原因的分析。现有成果虽有涉及失败原因的分析, 所得结论亦有一定的道理, 但本文试图将文化学院的创办纳入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国学教育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和分析, 尝试以新的视角, 归因文化学院何以创办失败。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虽然短暂, 但富有深意, 它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国学教育时代境遇的缩影与写照。希望本文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近代国学教育时代命运的理解和认知。

一、国学教育基础的奠定: 从私人情谊到学校教育的公共交往

现有成果中, 一般提及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 要么是从 1915 年梁启超“欲与学校方面多所联系”^[1]开始, 要么是从 1921 年私立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参加开学典礼算起。其实, 梁启超与私立南开颇有渊源, 而这渊源始于私立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张伯苓与梁启超的互动往来。查阅《严修年谱》, 早在 1912 年 10 月 12 日, 严修就曾拜访梁启超, 但稍显遗憾的是“谈未数语, 客络绎而至, 不能尽其辞, 辄先辞出, 异日再来”^{[2]281}。此时的梁启超刚刚结束长达 14 年的流亡生涯, 从日本归国不久。鉴于梁启超的声望, 访客络绎不绝。这次见面是否为二人首次见面, 不作考证, 但从相关记载来看, 对于因访客太多而中途“夭折”的拜访, 严修也颇感遗憾。尽管如此, 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自此便拉开序幕。

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早期互动并非围绕国学教育, 而是基于与私立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张伯苓之间的个人情谊而展开的私人交往互动。据《严修日记》《张伯苓年谱长编》记载, 梁启超与严修相识应早于张伯苓。因此, 1915 年 1 月 20 日, 严修在北京北海为介绍梁启超事, 致函张伯苓^{[3]129}。1 月 30 日, 严修约请梁启超、张伯苓等, 梁启超相赠《欧洲战役史》^{[2]332}。自此, 梁启超

^① 私立南开学校是严修、张伯苓所办学校的统称, 包括私立南开中学、私立南开大学等。

与严修、张伯苓3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日渐频繁,私人情谊也日渐深厚。基于此,严修于1915年11月6日致函梁启超,力劝其戒“樗蒲之好”,乃因“吾国人崇拜先生者众矣。演而以为仿,行而以为表,所系甚钜也。”^{[2]347-348}。

随着严修、张伯苓与梁启超之间的私人情谊日趋熟稔,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互动渐由基于私人情谊的私人交往转至学校发展的公共交往。梁启超也逐渐参与到私立南开学校的办学中来,并受邀参与私立南开学校的相关活动。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受邀到南开学校演讲。演讲中,梁启超表达了对私立南开的赞许之情以及盼与南开互动的迫切愿望。“鄙人旅居津门时,即希令子弟来斯学校,并期来此参观,以冀得悉贵校详情,而与学校方面多所联络。盖国中兴学多年,明效尚未大著,使全国学校能悉如南开之盛名,则诚中国前途之大幸。职此之故,接洽之心,益为迫切。”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勉励南开学子担负起社会的期望。“现今国内对于贵校学生,甚希望大有作为于社会,并望贵校荣誉日与俱长。负斯责者,是在诸君。”^{[3]178}对于此次演讲,周恩来曾在《梁任公先生演说词志》中有所记载,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演讲“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脑海”^{[3]179}。显然,梁启超的演讲深得南开学子的赞许。但是,较为可惜的是,这样的演讲在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早期互动中并不多见。对于忙于政治事务的梁启超而言,走进学校演讲也实为难得。

梁启超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并在私立南开发表演讲,或者说梁启超之所以愿意与私立南开(包括与严修、张伯苓)保持互动,其原因概与如下因素有关:其一,基于共同的教育改革的认知。在教育改革的认知上,梁启超与严修有共识。诸如在科举改革上,梁启超对严修的举措颇为赞赏。1897年,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奏请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梁启超对此高度评价并赞许道:“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4]32}在梁启超看来,“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4]27}。应该说,梁启超与严修在科举改革上的共识,为后来二人之间的往来互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二,基于私立南开办学质量的认可。私立南开因开办中学而享有盛誉。蔡元培称赞南开中学为“国中知名之学校”^[5]。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伯屈在其日记中称张伯苓“是中国中学教育的先驱者,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人”^{[3]191},从侧面肯定了南开中学的办学质量。鉴于对南开中学办学质量的高度认可,梁启超也乐于与私立南开展开互动,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接洽之心,益为迫切”。也基于此,梁启超将其子送入私立南开。

当然,作为互动的另一方,私立南开是乐见梁启超参与到学校办学中来的。私立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学费和社会捐助。因此,梁启超与私立南开互动所带来的“名人效应”是严修、张伯苓所需的办学资源。借由“名人效应”,私立南开可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以利于吸引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生源以及社会捐赠,确保办学经费的稳定获取。这在私立南开与梁启超的后续互动中有更为具体的体现。

随着张伯苓、严修先后赴美以及梁启超启程赴欧游历,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早期互动告一段落。尽管如此,这一短暂的“互动交往史”却为后来梁启超试图与私立南开合作,共同开办国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国学教育的展开: 重心转移与文化学院的筹建

自1918年12月梁启超计划赴欧至1920年3月归国,一年有余的欧洲游历对于梁启超的人生经历而言,具有转折性意义。就社会活动重心来说,欧洲之旅强化了梁启超由政治到对中国古典文化重新阐释的重心转移。

自1912年从日本归国之后,梁启超积极参与政治,并为袁世凯举旗呐喊。因此,梁启超深受袁世凯的赏识,继而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当袁世凯暴露称帝野心,梁启超继而策划武力讨伐袁世凯。在此以后,梁启超还出任过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等职。1917年11月,随着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垮台,梁启超也随即辞职。政潮中的浮沉,致使梁启超萌生退隐官场政治之意。在游历欧洲之前,梁启超曾与友人忏悔“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并“相约以后决然放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6]562-563}。时值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想乘机走出国门,一来“求一点学问”,二来打算将“我们的苦冤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以求“尽一二分国民责任”^[7]。由此,梁启超于1918年底前往欧洲考察。在欧洲一年有余的实地考察,使梁启超的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其竭力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追求,转而要以西方的辩证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8]。因此,梁启超社会活动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将“大半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古代的著述和讲学上”^[9]。

基于此,创办大学也成为梁启超在欧洲游历过程中谋划的归国事项之一。1920年1月12日,张君勱致函黄溯初述及梁启超的归国计划,其中就包括兴办大学事项。不过在张君勱看来,开办大学实属不易,“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6]576-577}。如张君勱所言,20世纪20年代前后私立大学办学并非易事,但从函件可知梁启超对于办学还是抱有相当之兴趣和期待。梁启超在赴欧之前曾被推举为中国公学校长,旅欧归来,曾有意接替校长王敬芳接管中国公学。但鉴于蒋百里的建议(认为梁启超只宜任教,而不宜出任校长),以及中国公学办学经费筹措的现实压力,梁启超最终放弃出任校长一职,而由张东荪代理校长(名义校长为王敬芳)兼教务长^{[10]69}。然而,梁启超所寄托希望的中国公学办学并不顺利。接连爆发的风潮以及改制大学所需经费的短缺使得张东荪对于中国公学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以致萌生退意^{[10]71-72}。为此,梁启超曾致函蒋百里、张东荪等,表明对于风潮以及办学的态度:“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搏沙(笔者注:王敬芳)无论如何总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6]603}对于中国公学,梁启超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希望尽最大努力维持办学。在随后的信函中,梁启超进一步要求蒋百里等“要尽其力所能及,将此校办好”^{[6]606}。

在勉励张君勱、蒋百里等在中国公学的继续办学之外,梁启超也在试图谋划拓展国学教育“根据地”。因此,梁启超强化了与私立南开的互动。1921年1月6日,梁启超受邀颁发南开大学各组网球比赛优胜奖品以及足球第一队奖^{[3]273}。1921年9月1日,梁启超应邀在南开演讲大学之责任。9月12日,梁启超受聘讲授中国史,题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从该日始授课,课时为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且该课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据记载,第一次讲课听讲约

数百人之多,天津各校教员、学生来旁听者颇多^{[3]283-284}。1921年11月21日,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演《市民与银行》,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影响市面金融问题发表讲话,除历史课学生外,还有南开中学学生及校外人员听讲^{[3]288}。

鉴于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密切往来以及迫于生计的现实考虑,1921年11月26日,蒋百里致函梁启超谈及与私立南开共同办学的想法“先生于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笔者注:梁漱溟)也担任一座,震(笔者注:蒋百里)与君劭(笔者注:张君劭)、东荪(笔者注:张东荪)每各担一座,每座讲演之期为四个月,文书口头研究之期为六个月,因每座专为内部学生不收外人,则由学校酌送束脩,大约连买书费在内得万六千金即足(若四人则更少矣)。若能公开,更添收一部听讲生则其效益宏矣。此事似尚轻而易举,而为震与君劭当前目下之生活问题,亦可同时解决,岂非一举数得。”^{[6]604}

1921年12月,梁启超致函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等,报告与张伯苓所谈在南开办学事宜:“南开事绝无问题,伯苓之着急过于吾辈。每见必询消息,我几无以应对。昨日讲义完了时,彼又来问君劭行止,我告以二十日内必到,彼重托设法,勿俾他处截留,我已允为尽力。此公办事权限分明(我从数小事看得极清),我已与彼言,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对于此事当经一次吾党会议后积极进行。百里所言立办自由讲座之说,我颇怀疑,鄙意先将此文科立定后再图进取。我与伯苓商,本是明年暑假后计划(但我辈若预备齐全,则寒假后进行一部分,亦未始不可),鄙意君劭当主任,百里、东荪、宰平(笔者注:林宰平)各任一门(宰平未与切商,谅必可来)。能找到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我的计划对于南开文科,原定预算外,由我设法为之岁募数千(谅不难办到),则我辈对于此科之关系愈深,而基础愈固(此科当然旁通理、商两科,则根底植于全校矣)……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其所益不已多耶?”^{[6]606-607}

从梁启超的致函中可知张伯苓对于梁启超的建议是“欢欣鼓舞”的。梁启超与私立南开的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有益处。一方面,对于梁启超而言,可以通过借助南开文科培植国学人才。当然,这其中亦有借助国学人才的培养,壮大派系力量之意。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私立南开也希望借助梁启超的盛名促进办学。不管是严修抑或张伯苓均深知办学的“名人效应”,因此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尤其是在办学经费的募捐过程中希望凭借梁启超的声望筹集更多办学经费。诸如1921年10月30日,南开学校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将来拟请梁启超撰写捐启序言^{[3]287}。事实上,梁启超也为私立南开大学慷慨撰写了《为南开大学劝捐启》。

基于此,1922年1月17日,梁启超、张君劭、张东荪、蒋百里等就在南开大学筹建文化学院会晤张伯苓。当然,张伯苓是乐见其成的。按照筹建计划,将由梁启超自任文化学院院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梁启超未能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遗憾。当然,创建文化学院仅有理想是不行的,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为此,梁启超发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谋求社会力量襄助办学。关于成立文化学院的目的,梁启超在该文中强调“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除此之外,梁启超也述及了“现在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并以此纠偏,实行半学校半书院的

办学组织形式。该文也明确了文化学院在“教导以外拟办诸事”,包括:(1)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译、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2)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2)编写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等^{[6]633}。

文化学院筹建计划一经公布,引起了社会关注以及私立南开的高度重视。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先生创办文化学院的计划和征求赞助的启事,遍达各处后,名流中复书慨愿捐助者颇不乏人,学生中因仰望而致书愿来受教者也大有人在。”^{[6]634}《南开周刊》对此亦有报道“自梁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①后,一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无二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梁任公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3]316}

按照梁启超的计划,文化学院拟在1923年秋季开学。但遗憾的是,此项计划最终未能实现,这对于私立南开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教育而言,均是极大的损失。

三、无疾而终的国学教育: 失败原因

关于文化学院计划最终夭折的原因,学界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大概仍是经费的困难”^{[6]634};二是认为主要因为“梁启超对于私立大学创办的雄心很大,实缺乏确定的规划”^[11]。以上诸原因,固然是导致文化学院失败的重要因素,但不管是因为经费的原因,抑或梁启超的个人因素,均未将文化学院计划的失败放在近代私立大学创办的时代背景以及国学教育的时代境遇层面上加以考察。

从文化学院公布的创办计划来看,授课者多是梁启超的门生,因此师资应不是文化学院创办面临的最大问题。办学经费的筹集才是创办文化学院亟须考虑的核心议题。按计划,文化学院所需最低限度经费包括:建筑费4万元,购置图书费2万元,头两年经费共4万元。尽管文化学院设在“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但“文化学院简单之建筑终不可少,即此亦非三、四万不可”,可现实捐赠情况却是,虽然响应者不乏其人,但“所得者尚不及十分之二也”^{[6]633-634}。就20世纪20年代前后私立大学^②创办的时代背景而言,创办者不仅需要发布创建计划,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筹措办学经费。

从教育政策层面来说,政府虽鼓励私立大学的创办与发展,但除了在相关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外,并无办学经费上的资助。在政府看来,私立大学(包括其他私立学校)虽然重要,但终究是扮演“辅助国立大学教育高等人才”^[12]的角色。从社会背景来说,自袁世凯去世之后,派别纷争、地方武装冲突不断。“在民国期间,举凡地方性和地区性,以致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数十百次之多。”^[13]文化学院所在的平津地区,在1920—1922年就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战争:一是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二是1922年4月爆发的直奉战争。两

① 关于梁启超所筹建的办学机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名称,分别是东方文化研究院与文化学院。本文以梁启超发表的《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的名称为准。

② 本文所指私立大学是指国人自办的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具体包括私立大学与私立专门学校,不含教会学校。

次战争对于平津地区办学生态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再从社会民众的公共精神来说,资助兴学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也不利于私人办学。这也是司徒雷登为什么能够体谅张伯苓办学不易的原因之所在,因为相比之下“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与宗教方面的呼吁……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14]。

基于此,想要创办并维持私立学校的生存,则必然需要倾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以获取办学资源。查阅1922—1923年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在此期间梁启超的精力并非完全用在文化学院的创办上。除讲学、著述、办报外,中国公学依然是梁启超着力关心的重要事项,所耗精力颇多。而与文化学院相关事项,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则较少提及,可见文化学院并未成为梁启超在此阶段主要顾及的对象,或者说在诸多事务当中,文化学院的重要性尚未达到梁启超所要着力考虑的程度。在中国公学因办学经费岌岌可危的窘境之下,梁启超难有精力顾及文化学院的创办以及办学经费的筹措。这是文化学院创办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现有成果中鲜有涉及。

当然,文化学院创办失败也与国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的时代境遇有关。与国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在专业设置方面显得更为务实,常会选择一些实用性较强且易于就业的专业。如此专业设置也导致了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处境堪忧。

就专业设置而言,私立高校中少有国学相关专业。以1918年为例,经政府立案认可的私立大学中,仅武昌私立中华大学设有“文科哲学门”,私立中国大学设有“文预科”^{[15]179-180}。而立案认可的私立专门学校中尚未见国学相关专业的设立^{[15]187-19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立大学中,多有设置国学相关专业,诸如国立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南京高师、武昌高师,以及后来成立的东南大学等均设有国学相关专业,清华学校还因办有国学研究院而享有盛名。因有充足的办学经费,梁启超亦有底气将清华国学院打造成国学重镇^[16]。因属国立大学,东南大学也才有可能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其所创办的《学衡》杂志影响深远,以至成为学术流派。在私立大学的办学中,国学并非其首选专业,尤其在私立大学初创时期更是如此。中国公学即是例证。中国公学除了办理中学外,还“附设师范、理化、英文、算学等专科,以应时需”^[17]。民国之后,在孙中山、黄兴等支持下增设政、法、商专门科,三科之中,商科发展最好,直至1925年中国公学才添设哲学系。

此外,即使私立大学中设有国学相关专业,也多惨淡经营。私立大学中,专门以国学教育而著称的当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下文简称“无锡国专”)。无锡国专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国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无锡国专之所以能够维持办学,离不开施肇曾的大力资助,并承担了无锡国专初创时期的全部开办经费^[18]。即便如此,随着战争对办学环境的破坏,以及办学规模的扩大,无锡国专也曾濒临停办。无锡国专如此,遑论其他私立大学。无锡国专实属个案,普遍的情况却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学的大量输入,传统文化乃至国学教育招致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在科系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常常让位于实用性学科。以私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为例,鉴于校长林文庆“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厦门大学于1925年冬才开始着手筹办国学研究院。1926年10月10日,国学研究院成立,校长林文庆亲任院长,沈兼士、林语堂分任研究院主任、院总秘书,实际工作由沈兼士负

责^[19]。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可谓轰动一时,然而不幸的是,却因此爆发了学生风潮。关于风潮的缘起与经过,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讨论,不过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20]。鲁迅亦认为,在厦门大学“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21]。在这场文科与理科的竞争中,最终以国学研究院停办的方式结束。

四、结 语

不管是梁启超在私立南开大学创办的文化学院,抑或厦门大学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其实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国学教育时代境遇的缩影与写照,它受制于私立大学自身的性质与办学模式,也受制于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当然,除此之外,国学教育在私立大学中的式微也与西学的引入而导致的学科分化密切相关。国学教育不再“是从整体性上掌握的一门学问”^[22],而是嵌套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之中。具体来说,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也留存了传统国学的相关内容。国学作为整体之学遭到了现代学科分类的挑战,陈独秀对此就曾批评道:“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学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23]在此背景之下,依然有私立大学不单开设国学相关专业,甚至专门成立国学研究院。然而,鉴于私立大学本身的性质以及实用主义思潮的侵袭,国学教育在近代私立大学的命运可想而知。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的国学教育是近代国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私立大学中国学教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国学教育在近代社会的时代命运,也有助于为现代国学教育的开展提供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 [1] 夏嘉,应之. 陶行知、梁启超、张学良与南开学校[J]. 天津师大学报, 1987(3): 91-95.
- [2] 严修. 严修年谱[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 [3] 梁吉生. 张伯苓年谱长编: 上卷[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 [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 第一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5] 蔡元培. 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M]//蔡元培教育名篇.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64.
- [6]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7] 李喜所, 元青. 梁启超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62.
- [8] 李喜所. 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5): 110-116.
- [9] 夏晓虹. 梁启超: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94.
- [10] 左玉河. 张东荪传[M].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
- [11] 尤小立. 梁启超的私立大学梦[N]. 南方读书报, 2014-05-18(08).
- [12] 教育部. 准予北京各私立大学正式立案布告(第六号) [G]//潘懋元, 刘海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462.
- [13] 费正清, 费维恺.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上卷(1912—1949)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89.
- [14] 司徒雷登. 我所认识的张伯苓[G]//梁吉生.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5: 270.

- [15] 教育部. 教育部公布全国大学概况[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3 辑·教育. 南京: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
- [16] 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308.
- [17] 王云五, 丘汉平, 阮毅成, 等. 私立中国公学[M]. 南京: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2: 1.
- [18] 吴淦南.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47-48.
- [19] 洪永宏. 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 第 1 卷[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72-76.
- [20] 顾颉刚. 顾颉刚就厦大第二次学潮致胡适函(1927 年 2 月 2 日) [G]//黄宗实, 郑文贞. 厦门大学校史资料(1921—1937): 第 1 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281.
- [21] 鲁迅. 鲁迅评厦门大学[G]//黄宗实, 郑文贞. 厦门大学校史资料(1921—1937): 第 1 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279.
- [22] 梁涛, 陈来, 黄朴民, 等. 国学是一门学科[N]. 光明日报, 2009-10-12(12).
- [23] 陈独秀. 国学[M]//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516.

(责任编辑 吴朝平)

The Time Circumstance of Sinology Education: the Interaction of Liang Qichao and Private Nankai School (1912—1923)

JIN Guo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The Sinolog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dium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ang Qichao and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The early interaction of Liang Qichao, Yan Xiu and Zhang Boling provided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launch of Sinology education of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The speech, lect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e school were the concrete practices Liang Qichao carried out to launch the Sinology education. Although the culture school fail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ang Qichao and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has profound meaning, and it is the epitome and portrayal of the situation of Sinolog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Sinolog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Sinology education. The study of Sinology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 fate of Sinology education in modern society, and to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launch of modern Sinology education.

Key words: Sinology education; Liang Qichao;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private university; pragmatism